

陈永洲事件应成为摆正媒企关系的契机

■ 任斯理

《新快报》陈永洲事件,或许可成为2013年中国媒企关系最受关注的新闻之一。

10月18日,广州《新快报》记者陈永洲被长沙警方跨省刑事拘留;随后,10月23日,《新快报》头版头条发表了重磅言论《敝报虽小,穿骨头还是有两根》,呼吁长沙警方“放人”。10月26日,身处湖南长沙第一看守所的陈永洲向办案民警坦承其受人指使,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连续发表针对中联重科的大量失实报道,并收受他人好处费50万元。10月27日,《新快报》在头版就陈永洲收钱发表失实报道向公众致歉。

那么,事件的另一个当事方中联重科呢?

早在2012年9月份,陈永洲负面报道开始的时候,中联重科并没有进行正面回应,这其中自然有担心事件会闹大的心理。对于一家企业而言,面对媒体时选择避其锋芒已成潜规则。

到了今年7月12日,网上流传出

不论企业与媒体的关系是亲密也罢、疏远也罢,二者之间真正的相处之道,其实都源自于他们自身。或许,对于如今有被异化倾向的媒企关系而言,陈永洲事件应成为摆正二者关系的一次契机。

一篇《陈永洲死磕中联重科,幕后黑手究竟是谁?》的文章,里面讲到陈永洲发表十篇“箭穿心”的负面文章内容存在严重失实,背后是有利益集团指使。但是,这篇文章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而恰恰是《新快报》为了维护记者权益而进行的头版报道,扩大了这一事件的影响力,无形中帮助了中联重科摆脱负面消息。

实际上,中联重科的行为看起来更像是经过策划,并不像是拍案而起。而对于“幕后”的猜测,也难免公众不会朝另一家企业的方向去想。这些都不能不让我们思考,如今的媒体和企业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让我们不得不联想到的是,2006

年,“西瓜注了红药水”的网络传言令海南等地瓜农损失数亿元;2008年,“橘子有蛆”的网络传言更令中国第二大水果柑橘严重滞销,损失达15亿元;还有2012年的达芬奇家具与CCTV,2013年农夫山泉与《京华时报》的“标准门”……

近几年,由于新媒体发展异常迅猛,媒企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媒体从业人员一方面承担着监督企业、维护公众利益的责任,一方面又与一些企业有着利益往来。这就像本身信奉神明的人,却通过出卖神像来养活自己一样,一些立场不够坚定之人,在名利的诱惑之下开始代人投刀。

对于企业来说,媒体由于手中握

着舆论利剑,所以多数时候面对媒体是弱势的。企业一方面需要媒体对自己做正面宣传,一方面又担心与媒体走得太近而暴露自己不为人知的商业机密。

实际上,不论企业与媒体的关系是亲密也罢、疏远也罢,二者之间真正的相处之道,其实都源自于他们自身。

对于媒体来说,公信力是安身立命之源。媒体作为监督者,同时也是被监督者,若媒体把公共监督变为徇私的工具,最终失去的将不止是公信力,还有自己的生存空间;对于企业来说,正身立本是发展的基石。企业作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在面对负面舆情时首先应选择积极应对,不仅是回应媒体,更是回应公众的质疑,而态度诚恳则是关键。

如今,陈永洲甚至包括《新快报》恐难免刑责,中联重科则更是两日损失市值高达33亿元。事件无论朝哪个方向发展,两个事件当事方已是两败俱伤。

或许,对于如今有被异化倾向的媒企关系而言,陈永洲事件应成为摆正二者关系的一次契机。

承担养老金历史欠账将拖累中国企业

■ 丁是钉 张本

为什么要延迟退休?为什么要延长养老保险缴费年限?显然是现有的养老金不够。为什么会不够?当然不是因为缴费少,而是因为缴费的人要养活不缴费的人。

最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尹成基在回答养老保险热门话题时表示,历史债务问题是由国家财政和社会保险共同来弥补的,但主体是社会保险费的征缴收入。言外之意,就是要由缴费的单位和个人承担由国家政策造成的历史债务。

在现行养老保险制度建立以前,单位和个人是不向国家缴纳养老保险金的,这是造成目前养老保险资金巨额亏损的重要原因。但单位和个人没有养老保险金这个项目,不等于事实上国家没有收取这项费用。在国有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之前,除维持企业和工人简单再生产的资金以外,所有的收益都以利税的形式上缴给国家,而国家和企业承担着工人老病残所有的负担。这意味着,当年的企业和劳动者不是没有缴纳养老保险费用,相

如果因为企业养老保险缴费负担的加重,导致企业用工意愿和数量的减弱,不可避免地会加重社会就业压力。其结局就是:表面上政府把养老金亏空的难题转移给了企业,但却又把更困难的就业包袱背在了自己身上。这其中的利弊尚需仔细权衡。

反是缴纳了超额的养老保险金。在国家进行国有企业制度改革的时候,剥离了国企员工住房、医疗、养老等一系列原来的义务,却没有拿出一块资金来处理遗留的问题。

从责任、义务、权利对等的原则来讲,这一块历史负担应当由国家财政来承担,或者是由国有企业的资本收益来承担。而目前主要由社会保险费的征收收入来承担的思路,显然会加重缴费单位和个人的负担,并由此伤害中国企业的竞争力。

在目前养老保险制度下,企业所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用已经占到工资总额的20%,无论是延迟退休,还是延长缴费年限,都会增长企业的

支出。众所周知,目前中国现有工资制度差不多是年龄越大员工工资越高,在养老保险缴费基数和工资直接挂钩的制度下,这意味着雇佣一个因年老而劳动能力下降的人,却要为其支付更高的养老保险金。而延长缴费年限的方案,更是让企业没有获得任何劳动力增加价值的情况下,单纯增加了养老保险缴费额度。

近年来,由于企业税负过重和人工等成本上升过快等原因,在中国投资建厂的比较优势发生逆转,一些跨国公司正在撤离中国大陆,并且有相当数量的低附加值行业的国内企业,已经或正在考虑向异国去投资办厂。当前,实体经济空心化

的趋势已经严重危及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转型,养老保险亏空一旦转嫁到企业身上,中国企业的盈利能力将进一步下降,资本的投资意愿也将随之降低。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而言,特别是在当前迅速城市化背景下,就业是一个关系到稳定和发展的大问题。如果因为企业养老保险缴费负担的加重,导致企业用工意愿和数量的减弱,不可避免地会加重社会就业压力。其结局就是:表面上政府把养老金亏空的难题转移给了企业,但却又把更困难的就业包袱背在了自己身上。这其中的利弊尚需仔细权衡。

目前的养老制度实质上相当于在其建立初期,政府与企业和个人建立的一种经济契约。政府增加企业和个人义务和负担的要求,在不能够得到企业和个人普遍性认同的情况下,如果进行相应制度和政策的修改,就等于政府单方面的毁约。这显然会严重伤害政府的信用,同时也会增加企业和民众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这种风险必须慎之又慎。

访谈

“国考热”与“招工冷”并存值得反思

——专访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

■ 本报记者 蒋皓

每年的秋季有大量的应届毕业生毕业,但企业的招工形势却不容乐观,比如近日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就在不同场合表达了“招工难”。而另一方面,公务员大考却热度不减,政府部门成了就业的香饽饽。

年轻人选择不能直接产生经济利润的机构,是否真能发挥他们的创造性,实现人生价值?这一热一冷凸显了什么样的社会问题?对此,《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了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社会问题学家胡星斗。

《中国企业报》:公务员考试依旧炙手可热,为什么现在年轻人如此热衷进国家公职机关单位?这种择业倾向是否足够理性?

胡星斗:“国考热”说明公务员吃香,说明许多公务员的待遇比较优厚、工作稳定,吸引了年轻人。但是年轻人热衷于当公务员不是好事,会导致大量的人才浪费。除非年轻人有政

治天赋、行政才能,否则当公务员等于浪费生命,因为机关的准则是下级服从上级,规矩矩矩、循规蹈矩,几乎不需要创造性,太具有创造性的人反而容易出“乱子”,在机关是待不下去的。

有理想、有才华的年轻人应该去企业、去基层,才能发挥他们的创造性、实现人生价值。只看眼前,觉得国家机关待遇好是鼠目寸光,未来中国必将推行行政改革,精简机构,许多公务员可能面临转岗;公务员也将要申报与公开财产,他们的财政养老制度可能也会改变,所以年轻人不能只看一个方面,要综合考虑什么岗位适合自己,未来什么工作是社会最需要的。

《中国企业报》:对很多企业来说,现在已经不仅是一线操作工难招。您认为什么是造成企业招工难窘境的根本原因?这一冷一热,会产生什么样的弊端?

胡星斗:企业招工难的根源是由于国有企业垄断的挤压、税负太重、

融资难等造成了民营企业的弱小、生存艰难,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法治环境太差,以至于许多民营企业只能钻法律的空子、偷逃税、与腐败官员勾结才能勉强生存,他们一般开不出高工资,甚至没有条件从事研发,所以大学生、年轻人一般不愿意去民营企业。加上目前中国的产业低端化,一些大学生认为企业不需要什么人才。

现在,就业倾向过度集中于公务员、大型国企等用人单位,弊端显而易见,既会弱化有关基础产业的发展、导致整个社会发展不均衡,也会加剧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影响社会和谐。因此,引导构建合理的择业观显得紧迫而重要。

《中国企业报》:我们看到,实际上公务员录取的比例是相当小的,如何说服涌入国考的大部队人马转向企业工作岗位?如何从根子上解决这个问题?

胡星斗:除了年轻人要转变观念、要到企业、基层去奋发有为之外,

政府也应把重点放在扶持民营企业发展上,从税收、融资、经营环境、法治保障等方面确保民营企业有发展前途、有保障;国家还要大力推进产业升级、经济转型、鼓励研发、建立企业研究院,这样才能逐渐吸引年轻人。

解决国考热,最主要的是解决官本位的问题,解决行政权力过大以及行政权力过度干预市场经济的问题。现在国家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减少行政审批,这样官员的权力越来越小,当官的吸引力也会越来越小。我们希望年轻人能更多地到中小企业去就业,那么就须改善中小企业的发展环境,使资源配置向中小企业更多倾斜,这样才能起到积极的导向作用。如果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一直堪忧,怎么可能让择业者心生向往?从整个社会而言,合理的择业观应当是多元的。而要实现这一点,就要求通过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让所有行业企业都有机会获得较好的发展。

来论

“调控拳”之下 新概念地产择路挺进

“

中国的房地产行业从来不缺炒作素材。早些年,开发商为了能将做好的房子卖个好价钱,什么“健康住宅”、“亲情住宅”、“教育地产”、“水景住宅”等概念,变着花样地讨好消费者。

■ 特约评论员 江金祺

莫说青山多障碍,房子围着青山盖。这里的“青山”指的是房地产调控政策。

就在“深八条”和“京七条”相继为中国楼市调控作背书时,复兴老板郭广昌正式决定,未来三年将投资逾百亿元,在海南建造一座七星级酒店。与此相呼应,由万达集团投资超200亿元打造的中国华东地区最大文化旅游项目,10月27日在合肥正式动工。当然,再往前追溯一点,远洋地产不久前宣告自己已建成了第一个养老地产项目;万科曾宣布投入120亿元在长春市打造养老地产项目,绿城集团则对外表示,未来三年重点关注养老项目。

中国的房地产行业从来不缺炒作素材。早些年,开发商为了能将做好的房子卖个好价钱,什么“健康住宅”、“亲情住宅”、“教育地产”、“水景住宅”等概念,变着花样地讨好消费者。

现在,随着政策发生偏转,各类概念也由营销型转到“功能型”,如上所说的旅游地产、文化地产、影视地产、养老地产等,尤其是被业内称作“文旅地产”,作为一种新业态,在万达、万科、保利、中海、招商、华润等老牌地产商的轮番演绎下,近期从渤海湾到珠三角,从长白山到海南岛,从东部沿海到西部山川,投资过百亿的大型文旅投资项目风生水起,并且,超五星级酒店、度假别墅、高尔夫球场等,似乎是每一个旅游地产项目的标配。

比如,万达这次投资的合肥万达城,据说这是继哈尔滨万达文化旅游城、南昌万达文化旅游城、青岛东方影都之后的第四个文化旅游项目。建成后不仅包括室内水公园、室内电影乐园、室内主题公园,还将打造一个含1座五星级酒店、2座四星级酒店、3座三星级酒店的星级酒店群。

国务院于2009年正式将文化产业和旅游业上升为国家战略,这应该是策动开发商纷纷挺进文旅地产的原动力,但从产业形成的梯度上分析,现行步步进逼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才直接导致了开发商不得不错开调控锋芒,另辟蹊径寻找新市场。对此,万达老板王健林在参加合肥项目开工典礼时就表示:近几年的楼市调控总体来说并不成功,因为调控的方向发生了偏差。而在调控的另一面,文化产业投资却不会有“天花板”。

无论是今天的“京七条”,还是过去的“国N条”,大家都知道,调控的核心内容不是降房价而是调结构。当前来看,新概念地产之所以表现出齐头并进的态势,是由于中国的住宅市场整体紧缩,且相关的政策性调控一眼看不到头,迫于政策压力和市场空间,投资商由此掉头开进非住宅市场,似乎不难理解。此外,土地财政受到抑制,地方政府积极出台政策鼓励旅游项目开发也是原因之一。对此,北京大学吴必虎教授曾表示,文旅地产过快发展,是因为理论研究跟不上,其次投资者的对风险还没形成认识;再有,地方政府对项目进行匆忙批示的情况时有发生。

文旅地产作为商业地产的细化,当前市场上真正意义的此类项目并不多见。真正意义上的文旅地产,必须先有文化或旅游因子的存在,不是说换着一片海或靠着一片林,圈一片地盖房子就说在做文旅地产。只有开发商对文化、旅游资源进行很好的整合,只有当文化旅游真正成为一种常态化的生活方式,只有当地产项目与自然景观得以合理嫁接时,文旅地产才有可能做好。正因为统计口径收窄,有专家指出,在目前的文旅地产项目中,比较成功的只有20%左右。

文旅地产如此,养老地产也没好到哪里。近期有报道,位于北京东城景泰桥南的北京康泰老年公寓,因开业17个月入住率不足一成,不得不将旗下大部分物业出租给7天连锁酒店,新酒店将于11月开张。

康泰老年公寓绝非个案。据粗略统计,目前全国有30多家品牌房企参与养老地产,尤其是上个月,随着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这让养老地产的投资再度升温。但观察者认为,许多企业转身去做养老地产,但真实用意是借此实现“圈地”目的,因此,虽有一哄而起之势,但实际建成的并不多,有的甚至出现了“挂羊头卖狗肉”的现象。

由此看来,新概念地产待解决的问题不在少数,不过业内人士还是认为,持续绷紧的房地产调控,拉动内需的改革路径等,对新概念地产的未来无疑利好,尤其从新一届政府的改革政策上看,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会再以国家投资拉动,而是要加大内需拉动,就是要让老百姓放心地花钱。

也就是说,内需一旦拉动起来,文化旅游业肯定会成为重点消费领域。另外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不只是靠近文化旅游景区才可发展文旅地产,一些历史文化氛围较浓的城市中心区或民俗村落,也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

(作者系知名媒体人)